塑造“真儒”:孔庙从祀与薛瑄著述的出版实践*

张 翼

内容摘要:明儒薛瑄从祀孔庙的过程与其著述编刻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面对从祀议定中对其“无著述”或“著述少”的质疑,薛瑄的支持者一方面重新界定“著述”在祀典语境中的内涵,另一方面则通过书籍编纂与出版实践作出回应。推动薛瑄入祀的官员与从事其著述编刻的士人群体,大多依托河东地区所形成的地缘、学缘网络与薛瑄本人建立联系。因此,薛瑄著述在百余年间的持续出版,并非被动的文献流布,而是薛瑄的支持者主动参与儒者形象塑造、学术话语竞争及地方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薛瑄 孔庙从祀 著述 书籍出版 地域网络

引言

薛瑄(1389—1464)为明代得以从祀孔庙的四位“昭代真儒”之一,也是明代首位获此殊荣之人。但相较于其他三位从祀者(胡居仁、陈献章与王阳明),薛瑄在明代思想史中的影响力却相对有限。当前学界对薛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内涵、学术流派及《读书录》版本的讨论上①。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历代别集编纂及其文学观念研究”(21&ZD254)阶段性成果。

①如许雪涛:《薛瑄〈读书录〉版本源流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74—78页;[日]白井順:《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薛瑄『讀書録』の刊行と變容》,《日本中國學會報》第六十一集(2009年),第151—166页;常裕:《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陈媛、刘畅:《薛瑄著作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及影响》,《孔子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3—124页;[新加坡]许齐雄著,叶诗诗译:《北辙:薛瑄与河东学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等。

学者指出，黄宗羲编纂《明儒学案》以阳明、蕺山为宗，并偏重南方学统的地域立场，一定程度上导致薛瑄在明代思想史的叙述中被边缘化①。然而，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演进脉络来看，陈、王二人的理学建树自不必言，胡居仁亦撰有《居业录》这部体系性著述，为研究其学术思想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反观薛瑄，其学以“践履复性”为核心，并不刻意追求著述层面的“立言”，其代表著作《读书录》《读书续录》在性质上属于读书笔记，结构较为松散，系统性差，也在客观上增加了对其思想进行深入挖掘的难度。

自成化元年（1465）薛瑄从祀之议初兴，至隆庆五年（1571）最终获祀，百余年间，薛瑄所撰《读书录》《读书续录》《河汾诗集》及《敬轩薛先生文集》等著述相继刊行。既有研究已揭示，陈献章、王阳明等人的文集编纂与流传，实为支持其从祀的重要“文化资源”②。由此即引申出本文最关心的两个问题：薛瑄著述的持续刊行，是否也与其从祀进程存在某种互动关系？当薛瑄在从祀过程中面对“无著述”或“著述少”的质疑时，其支持者是否曾借助书籍出版以回应此类批评？

事实上，薛瑄著述虽种类不多，但版本源流错综复杂，仍有赖细致的文献考辨与编刻过程的深度还原方可厘清。就《读书录》而言，其版本形态多样，包括十一卷本、二十四卷本、十卷本及与《读书续录》合编的二十卷本数种；若从整体来看，薛瑄著述呈现出由早期的各自单行，向嘉靖至万历年间“全集本”形态汇拢的趋势。不过，本文并非传统版本学意义上的“穷尽”式考证，而是尝试采取一种融版本学、书籍史与出版文化史于一体的视角，在全面调查明版薛瑄著述的基础上③，重点抽绎那些与从祀

---

①［新加坡］许齐雄著，叶诗诗译：《北辙：薛瑄与河东学派》，第15—20页。

②详参朱鸿林：《文集的史料意义问题举说：并论明儒陈白沙文集的文本差异问题》，《明人著作与生平发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9—285页；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孔庙从祀与乡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25—150页。

③据笔者统计，有明一代先后出版的薛瑄著述版本有20余种，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天顺、成化至弘治间为早期阶段，以薛瑄原编《读书录》十一卷、阎禹锡改编《读书录》二十四卷及张鼎所编《敬轩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为代表，诸本多为薛瑄门人弟子或乡后学所刻，并各自单行；正德、嘉靖年间为出版高峰，郑维新、萧鸣凤、陈棐等人相继刻印《读书录》诸本及《薛文清公全集》《薛文清公全录》等汇编性著作，使这一时期薛瑄著述的版本形态日趋多样；万历时期则延续之前的（转下页）

论辩、地方网络及道统建构有直接互动的核心版本节点，由此还原“孔庙从祀”与“著述出版”之间的双向互动。

一、“著述”之辩：祀议初兴与薛瑄著述的早期编刻

自唐贞观年间起，朝廷简选儒者从祀孔庙逐渐发展为历代相承的重要制度。其意义不仅在于以国家典制确认从祀者为儒学道统中的“昭代真儒”，更在于借此向天下昭示朝廷所认可、支持与倡导的学术方向与内容。薛瑄卒于天顺八年（1464），次年即成化元年，国子助教李伸与济南府知府陈铨上疏奏请薛瑄从祀孔庙，但侍讲学士刘定之却以薛瑄“无著述”为由反对，从祀之议“遂沮然”①。尽管历代从祀标准不甚相同，但大抵皆根植于以“立德”“立功”“立言”为核心的“三不朽”体系；而“著述”与“立言”又互为表里，成为从祀标准的重要评判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李伸等人上奏之初或已意识到薛瑄在著述方面的不足，因而援引颜回“未尝著书，而配享孔子”之例，主张“不可以因未书而不之取”；同时仍强调薛瑄所著《读书录》及其文集《河汾集》等能“发明往圣，垂忠后学”，故“宜从祀”②。需深究的是，薛瑄并非全无文字传世，其所撰《读书录》与文集皆可为证，何以论辩双方均默认其于“著述”层面有所缺憾？

事实上，即便是薛瑄本人，亦未必视《读书录》为严格意义上的“著述”。他在《读书录》自识中明言“余读书至心有所开处，随即录之，盖以备不思而还塞也”③，可见该书本质上为随感随录式的读书札记，而非系统性的学术著述。黄宗羲言《读书录》与《读书续录》“多重复杂出，未经删削，盖惟体验身心，非欲成书也”④，亦可为证。甚至，薛瑄一向强调身体力行的“践履复性”，而轻视文字层面的“著书立说”，主张“自朱子后性

（接上页）“全集化”趋势，赵讷、张铨、崔尔进等人先后编刻《薛文清先生全集》《薛文清公全集》等，薛瑄著述的“全集”形态至此基本定型。

①黄佐：《翰林记》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38页。

②《明宪宗实录》卷二四“成化元年十二月”，《明实录》第40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74—475页。

③薛瑄：《读书录》卷一，薛瑄著，孙玄常等点校：《薛瑄全集》，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687页。

④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七，中华书局，1986年，第110—111页。

理已明,正不必著书,程明道、许鲁斋皆未尝有所著作,而言道统者必归之”①,也进一步说明《读书录》的撰述初衷并非以“著述”“立言”为旨归。

也正因此,有学者指出,“著述”一词在从祀语境中当侧重于“解经”或“释经”文字之意②。故当嘉靖间薛瑄从祀之议复起时,反对者仍屡屡责以“瑄于六经少所著述”③、“瑄所著止《读书》一录,未能释然于罕所著述之疑”④;而万历间御史李颐上疏奏请胡居仁入祀孔庙时,所据理由之一即敬斋著述有《易传》《春秋传》⑤。就此而言,在孔庙从祀背景的论述中,“著述”一词确当偏重于指解经类撰述,而非一般之诗文札记。

然而,面对刘定之的质疑,李伸等人虽难以否认薛瑄“著述”无多的事实,却仍试图将《读书录》与《河汾集》纳入“著述”范畴,强调其足以“发明往圣,垂忠后学”,从而为从祀争取依据。甚至,当嘉靖间薛瑄的支持者面对“无著述功”的质疑时,反而强调薛瑄“所著《读书录》且十余万言,固濂洛关闽之绪,而六经之旨也。其为著述则亦已繁”⑥,直接将《读书录》等同于“著述”。由此可见,论辩双方因立场不同而对“著述”的界定产生分歧:反对者如刘定之取其狭义,将“著述”严格限定为解经之作,认为《读书录》与文集不属此类,故以“无著述”质疑薛瑄从祀的合理性;而支持者则通过话语策略,有意识地拓宽“著述”的指涉边界,将《读书录》与文集纳入其中,以强化薛瑄从祀的合理性。事实上,这一话语策略并非孤例。如陈献章从祀孔庙时,时人亦因其“著述少”有所质疑,而白

①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3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558页。

②朱鸿林:《元儒熊禾的学术思想问题及其从祀孔庙议案》,《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62页。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修订版)》,中华书局,2010年,第235—236页。

③唐顺之:《故礼部左侍郎薛瑄从祀议》,唐顺之著,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00页。

④徐阶:《世经堂集》卷六《薛文清祀议》,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43册,黄山书社,2016年,第153页。

⑤《明神宗实录》卷二二〇“万历十八年二月”,《明实录》第106册,第4123页。

⑥唐顺之:《故礼部左侍郎薛瑄从祀议》,唐顺之著,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第801页。

沙门人薛侃则辩称其“虽无著述,其《答人》《论学》等书已启圣贤之扃钥”①。表面上看,薛侃将《答人》《论学》等书信排除在“著述”之外,隐然承认了所谓“著述”当重在“解经”一侧;但他又不忘强调这些文本的思想价值,实则同样隐含拓宽“著述”认定边界的意图。至于王阳明从祀时所遇类似质疑,其支持者谢廷杰采取编印《王文成公全书》的方式,将阳明《传习录》与《文录》《别录》《外集》等部分统合为一套系统文献,以形式上的集成回应“著述不足”之批评,本质上也是希望通过书籍编刻来重塑对“著述”的认定标准②。需要指出的是,从祀论辩中“立言”的标准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诠释与操作空间,或与其在“三不朽”价值序列中处于相对低位有关。正因“立言”在“立德”与“立功”之下,其定义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以随着论辩语境和立场伸缩,为支持者通过话语策略和出版实践来重新定义“著述”、弥补“立言”之不足留下余地。

在此背景下,薛瑄的支持者随即对其著述展开了大规模的编印工作。现藏日本山口大学的《读书续录》十二卷,著录为“成化元年朝鲜刊本”,实具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卷首载有成化元年蒲州知州徐孚所撰序言:

> 公幼时读书,即以复性为事,其于四书及周、程、张、朱之书,至老未尝释手。有得于心,即笔于札,莫非发性命之渊源、明斯道之指授。自御史至理官,所札记者已为识者板行矣。及公释几务之重,退居龙门,日复以五经四书讲教于家,精思有得,复札记之,积为十卷。公薨,嫡孙禧方第进士,予宁葬公,捧以示孚……敬命工锓梓。③

由此可知,成化元年徐孚刻本当为《读书续录》的首次刊行。鉴于薛瑄《读书录》与《读书续录》在朝鲜地区流传甚广④,此朝鲜刊本极有可能是朝鲜士人据成化元年徐孚刻本重刊的。序中谓“有得于心,即笔于札……所札记者已为识者板行”应指《读书录》,暗示该书在薛瑄生前便

---

①潘相纂修:《〔乾隆〕曲阜县志》卷二九,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索书号:地 140.117/34),叶十七。

②详参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孔庙从祀与乡约》,第 125—150 页。

③徐孚:《续读书录序》,薛瑄:《读书续录》卷首,日本山口大学藏“成化元年朝鲜刊本”(索书号:立 90/16),叶一。

④详参陈媛、刘畅:《薛瑄著作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及影响》,《孔子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20—124 页。

已付梓;这也正可解释何以成化元年李伸等人的请祀奏疏中已明确提及薛瑄著有《读书录》。而“复札记之,积为十卷”的部分,则正指《读书续录》。该本实为十二卷,徐孚称“积为十卷”当为约略之辞,该本所据底本来自于薛瑄之孙薛禋。

成化二年,薛瑄门人阎禹锡在已有《读书录》刊本的基础上,对该书进行系统性重编。阎氏将原书重编为二十四卷,并交由章丘县令张庆刊行。该本今虽亡佚,但其基本面貌仍可借由现存嘉靖二年(1523)萧鸣凤刻《读书录》二十四卷本窥见。关于重编之缘由,阎禹锡指出:

> 《读书录》者,先师河东薛文清公手笔,前后二十四卷也。当先师著述时,中心有得,至忘寝食,随笔札记,未暇伦类,已版行于世矣。先师殁之二年,愚反复读之,深有感焉,乃仿《近思录》,分门别类,去其重复,厘为二十四卷。①

序中所谓“未暇伦类,已版行于世”的早期刊本,应即徐孚所言薛瑄生前已刊印之本。今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有一部《读书录》残本(索书号:301 05579),著录为“明成弘间原刊本”,存卷六至卷十一,首尾无序跋,卷端亦无题款,版式为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双栏,大黑口,双黑鱼尾。该本之分卷相当随意,颇合于“有得于心,即笔于札”“随笔札记,未暇伦类”的著述特征,其版式亦与明前期版刻风格高度相契。进一步比对可见,该本与嘉靖四年张珩刻《读书录》十一卷本(美国华盛顿大学藏,索书号:PL2698. H7777 D82 1525)在卷次划分上完全一致,故当为十一卷本无疑。张珩籍贯山西石州,与薛瑄所在的河东地区比邻,极有可能接触过《读书录》的原刊本。尽管张珩并未指出其刻《读书录》所据何本,但从《读书录》版本的整体情况来看,台北所藏此“明成弘间原刊本”很可能即为薛瑄生前付梓的《读书录》原本,或至少其十一卷的文本面貌当据原本而来。至于阎禹锡重编本为何要在山东出版,薛瑄曾于天顺年间提学山东,故阎序中称“山东乃先师持节提调学校旧历之地”②,这一地域因素恐是阎禹锡将该本付与张庆刊刻的重要考量。

阎禹锡之所以将《读书录》原本十一卷的规模改编为二十四卷,表面观之,是由于原书“未暇伦类”,故其仿朱熹、吕祖谦《近思录》之体例,将

---

①阎禹锡:《读书录序》,薛瑄:《读书录》卷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二年(1523)萧鸣凤南京刻本(索书号:301 00579),叶一。

②阎禹锡:《读书录序》,薛瑄:《读书录》卷首,叶三。

原书所载笔记分置于“道体”“经说”“论学”“论心”等类目下。实际上，阎禹锡不仅于序言中明确将《读书录》视为薛瑄“著述”，更通过改编赋予其严整的体例，并系统设置“经说”“论学”等类目以呈现薛瑄对经书的见解与学术思想，这一举动很可能意在回应成化元年刘定之对薛瑄“无著述”的质疑。早在薛瑄生前，阎禹锡已有向其索要新撰《读书续录》之举，但被薛瑄以“但愚老自备遗忘耳，亦何足观也”①为由拒绝。而阎禹锡在为薛瑄所撰行状中，也曾明确以《读书录》与文集为据反驳“著述少”之论，认为“世谓先生著述少者，岂足知先生之志哉！后之求先生者，当于此考之”②。正是在这一意图的指引下，阎氏又陆续推动了薛瑄《河汾诗集》等著述的刊印。

成化五年，常州府同知谢庭桂刻成薛瑄《河汾诗集》八卷。卷首附有谢庭桂《河汾诗集后题》，自称“蒲坂后学”，表明与薛瑄同里。此集原由薛瑄之孙薛禋编纂，复经阎禹锡校正，又由阎氏交与谢庭桂付梓。谢庭桂于景泰四年（1453）中举后曾短暂游学京师，于时薛瑄任大理寺卿，故谢氏有机会从学于薛瑄门下③。这段师承渊源，很可能成为谢氏日后积极刊刻《河汾诗集》的主要动因。

需要指出的是，薛瑄自天顺初年致仕后便在家乡授徒讲学，逐渐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河东学派”。河东地区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这一区位特征使得该学派自形成之初即带有“跨地域”的属性。有学者指出，薛瑄门人弟子多来自晋、陕、豫诸省与河东相接壤的地区④，而这一地域网络在薛瑄从祀及著述编刊的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弘治元年（1488），南京兵部主事娄性上疏奏请薛瑄入祀，但被礼部以“未可轻议”驳回⑤；随后礼科给事中张九功亦上疏请祀，仍遭礼部否决⑥。张九功籍贯河南陕州，正与薛瑄讲学的河东地区接壤。尽管暂无直接文献证明张

---

①薛瑄：《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十二《答阎禹锡书》，薛瑄著，孙玄常等点校：《薛瑄全集》，第440页。

②阎禹锡：《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薛先生行状》，薛瑄著，孙玄常等点校：《薛瑄全集》，第1126页。

③谢庭桂：《河汾诗集后题》，薛瑄：《河汾诗集》卷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成化五年（1469）谢庭桂刻本（索书号：402.6 11348），叶一至二。

④[新加坡]许齐雄著，叶诗诗译：《北辙：薛瑄与河东学派》，第97—99页。

⑤《明孝宗实录》卷十三“弘治元年四月”，《明实录》第51册，第293—294页。

⑥《明孝宗实录》卷十七“弘治元年八月”，《明实录》第52册，第413—415页。

九功曾受业于薛瑄,但这种地缘相近的因素显然不应被轻易忽视。类似情形亦见于成化元年请祀的济南知府陈铨,其动机很可能源于薛瑄提学山东的经历;而天顺年间泰山所存薛瑄撰文、陈铨行书的《重修东岳庙碑》①,进一步表明陈铨与薛瑄确有故交,从而支持了地域因素的判断。

弘治二年,薛瑄门人张鼎刻成《敬轩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该集虽以"文集"为名,实为诗文合刊本:前十卷为诗集,后十四卷为文集。然而,其中诗集十卷之内容,却与谢庭桂所刻《河汾诗集》存在较大差异。今人点校《薛瑄全集》时指出:"今详按《全集》《文集》所编收《河汾诗集》者,几漏收百四十余篇,五律尤多,达百一十余篇。"②由此可见,此十卷诗集的文本来源恐非《河汾诗集》。该集卷首载有张鼎所撰序言:

> 所著有《读书录》《续读书录》《河汾诗集》行于世,惟《文集》则先生孙前刑部员外郎禧曾托前常州同知谢庭桂板刊,未就。今年夏四月,前监察御史畅亨先生同乡谪官陕右,道过镇阳,予因访前集。畅曰:"某于毗陵朱氏得之矣。"予喜而阅之,但舛讹非原本矣。因仿唐《昌黎集》校正编辑,总千七百篇,分为二十四卷,凡三易稿,始克成编。於戏!先生《文集》流落江南二十余年,今传于世,岂非其数有所待与?③

此序所提供的信息颇为丰富。首先,薛瑄《文集》原拟与《河汾诗集》一并交由谢庭桂刊行,惜事未竟成。张鼎所刻之本,即以此《文集》为底本,故言"先生《文集》流落江南二十余年,今传于世"。而序中"舛讹非原本"一语则表明,除该《文集》外,薛瑄集尚有另一"原本"传世。早在成化元年李伸等人上疏时即提到薛瑄有《河汾集》一部,然该本今已不存,故尚难确考张鼎所言"原本"是否为此本。此外,该集卷端题"门人关西张鼎校正编辑"。张鼎系陕西咸宁人,"少从父之任蒲州,得及薛文清之门",畅亨则为薛瑄同乡,其携《文集》底本途经镇阳,为张鼎所见;而张鼎于弘治改元后"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等府"④。镇阳即真定府,可推知该集

---

①宋思仁:《泰山述记》卷六,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索书号:地731.4/36.84),叶六十五。

②孙玄常:《薛文清公文集点校说明》,薛瑄著,孙玄常等点校:《薛瑄全集》,第2页。

③张鼎:《敬轩薛先生文集序》,薛瑄:《敬轩薛先生文集》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弘治二年(1489)张鼎刻本(索书号:814783-90),叶二至三。

④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七,第125页。

为张鼎于保定巡抚任上编刊。然此集在短时间内似未能有效流传至薛瑄乡里,至弘治十六年,河东巡盐御史李越以“我朝文章大家如薛文清公《敬轩集》虽尝梓行,而传之弗广”①为由,在河东转运司对张鼎刻本予以重刊。

弘治九年,刑科给事中杨廉上疏请祀,在整个薛瑄从祀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杨廉并未直接奏请将薛瑄从祀孔庙,而是采取了一种渐进策略,先请求于河东地区建祠祭祀;另一方面,他在奏疏中指出《读书录》流传未广,世人难见,故建议朝廷借助官方力量予以重刊:“臣闻其《读书录》尝锓梓于山东章丘县,乞敕有司取其板本于国子监,俾陆馆诸生皆得摹印观览。盖自京师而达之天下尤易……此外仍以印本发下福建书坊,翻刻市鬻,务使天下之士皆得见之。”②杨廉此举对于扩大薛瑄及其《读书录》的影响力起到重要作用。他在疏中称“《读书录》尝锓梓于山东章丘县”,所指应为成化二年阎禹锡改编、章丘县令张庆刊刻的二十四卷本。此本经过改编,在内容次序与分卷模式上已与薛瑄原本存在较大差异。然而,无论杨廉是否曾见过薛瑄生前刊行的原本,在其奏请官方重刊《读书录》的过程中,阎禹锡所编二十四卷本始终是最为合适的选择——该本在卷次划分、类目设置等方面皆具备系统性的“著述”体例,较之原本的随意特征,更具备成为“经典”的潜力。因此,杨廉将二十四卷本视为《读书录》的权威版本,实则隐含着对薛瑄从祀过程中“无著述”之批评的回应。

此外,杨廉对《读书录》的传播机制尤为关注,提出以国子监官方刊印与福建书坊商业出版相结合的双轨模式:国子监本可凭借“自京师而达之天下尤易”的优势迅速推广,而福建坊刻本则以其价格低廉、流通广泛之特点来保障底层士人的阅读需求。杨廉上疏后,礼部予以支持,并进一步建议将《读书录》“一进呈御览,一启进东宫,一发福建书坊翻刻施行”,并获皇帝终允③。这一系列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薛瑄从祀奠定了舆论与文本基础。

要之,薛瑄祀议初兴的核心矛盾在于其“著述”是否符合“立言”标

①李腾芳:《重刊薛敬轩文集序》,薛瑄:《敬轩薛先生文集》卷末,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十六年(1503)李越刻本(索书号:09096),叶二。

②杨廉:《薛文清公事实》,薛瑄著,孙玄常等点校:《薛瑄全集》,第1130—1131页。

③《明孝宗实录》卷一二〇“弘治九年十二月”,《明实录》第56册,第2152页。

准。反对者取“解经”文字之狭义,责其无著述;支持者则以话语策略、文本改编与出版实践,不断拓展“著述”的边界。阎禹锡将《读书录》从“随笔札记”改编为二十四卷本,谢庭桂、张鼎、徐孚、李越等依托河东地缘与学缘网络编刊薛瑄著述,俱为回应“无著述”之质疑而发力。至弘治间杨廉奏请重刊,更以阎氏二十四卷本为官方“权威”版本,借国家与商业双重渠道予以推广。这一系列围绕“著述”之辩展开的编纂与出版实践,既重塑了薛瑄的儒者形象,也为其最终从祀奠定了基础。

二、布之天下:跨地域出版与薛瑄著述在嘉靖间的编印

至正德、嘉靖间,薛瑄从祀之议持续升温,其支持者亦展开了更大规模、更具跨地域特征的出版实践。从郑维新、萧鸣凤,到张珩、陈棐,不同背景的官员与士人相继投入薛瑄著述的编校与刊刻,使得这一时期薛瑄著述的书籍面貌日趋多样,深刻影响于此后“全集”的形态。

正德十五年(1520),时任河东巡盐御史郑维新于河东书院刊成《读书录》十卷。该本并未采用阎禹锡“分门别类”改编的二十四卷本体例,而是以原刊十一卷本为底本,仅对其分卷位次略作调整。该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索书号:GJ527),笔者暂未得见。相关信息另可见于嘉靖三十四年沈维藩刻本所存序言。郑维新序云:“今年秋巡视河东……偶安运使奎持此告予,以旧本漫漶,殊不便翻阅,欲重刻之于书院,以待来者。适与予意会也,因取而手校之,厘为十卷,付之锓梓。”①可知郑氏所用底本直接来自时任河东转运使的安奎。这一情形,或与河东地区的文献传播条件有关:其地处太行山麓,交通相对不便,在薛瑄故里,此际能够获得的《读书录》版本或仍以原刊十一卷本系统为主。因此,郑维新于正德年间所刻十卷本,表面看似是对《读书录》“著述化”编纂趋势的“逆流”,实则可能是受制于书籍跨地域传播条件的现实因素的结果。

而在郑氏所刻十卷本卷末,附有时任山西提学副使许赞所作后序,其言:“曩岁赞尝见弘农张给事疏,请以先生从食先师孔子庙廷。先帝深欲可之。今月湖杨侍郎疏请以《读书录》进备乙览,刻布国学,且谓本朝儒

①郑维新:《重刻读书录序》,薛瑄:《读书录》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沈维藩刻本(索书号:08905),叶二。

书,无先于此。制可。数十年后,复睹此举,先生之道愈远而愈昌矣。”①文中所指“弘农张给事”即弘治元年上疏请祀的张九功,“月湖杨侍郎”则为弘治九年奏请刊布《读书录》的杨廉。许赞此言的重要性在于,他身为山西地方最高学政长官,不仅清楚掌握朝廷内部有关薛瑄从祀的各种动向,更将郑维新刻书之举视为薛瑄从祀历程中的延续性举动。

嘉靖改元,已转任四川布政司右参议的许赞上疏朝廷,力陈薛瑄于“学术”“志节”“著述”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奏请将其从祀孔庙。在言及“著述”时,许赞认为,“至于著述之功,布之《集》《录》者,性命、道德、中正、仁义之言,皆有以发明圣贤之秘奥;阴阳、动静、刚柔、太极之论,又有以阐扬造化之几微。诚文行一致,学业大成之真儒也”②。将“著述之功”归于薛瑄文集与《读书》二录,固然是从祀支持者回应“无著述”质疑时所采用的常见话语策略,本质上仍是对“著述”边界的重新定义;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概念上的拓展,却正好构成“从祀之议”与“书籍编刻”间持续互动的底层逻辑——围绕嘉靖间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推动支持者从单纯的话语辩护转向实物层面的著述出版,以具象的书籍形态代替此前对“著述”定义的抽象论辩。

此外,许赞提炼出的“性命”“道德”“阴阳”等八个范畴,在体例松散、内容驳杂的“随笔札记”性质的《读书录》原本系统中,实难与原文一一对应。现有材料无法确证许赞曾见过阎禹锡所编二十四卷本,但其在奏疏中刻意将薛瑄文字归类为颇具系统性的哲学议题,在意图与效果上则与阎禹锡的重编工作遥相呼应——均旨在通过对文本的“再诠释”,塑造薛瑄作为“著述大儒”的整体形象。

嘉靖二年,督学南畿的萧鸣凤于任上重刊阎禹锡所编二十四卷本《读书录》。萧氏自陈“偶于予师月湖杨先生所求得《读书录》善本”,遂“锓梓以传”③。杨廉推广的正是阎禹锡所编之二十四卷本,而萧鸣凤的此次重刊,虽难以确证其底本究竟是张庆原刻,还是弘治间朝廷刊行之本,此举仍可被视为杨廉奏请推动《读书录》官刻事业的延续与回响。

---

①许赞:《重刻读书录后序》,薛瑄:《读书录》卷末,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四年沈维藩刻本,叶一。

②许赞:《崇真儒以隆圣治疏》,薛瑄著,孙玄常等点校:《薛瑄全集》,第1136页。

③萧鸣凤:《重刻薛文清公读书录引》,薛瑄:《读书录》卷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二年萧鸣凤南京刻本,叶一。

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四年,两淮巡盐御史张珩于任上刻成《读书录》十一卷并《读书续录》十二卷,是为《读书》二录的首次合刊。张珩所刻《读书录》部分实据薛瑄原刊十一卷本系统而来,而未采用阎禹锡改编本。此本与正德十五年郑维新编刻之十卷本类似,折射出《读书录》原刊本系统在山西地区的持续影响。至于张珩所刻《读书续录》十二卷的部分,当据成化元年徐孚刻本重刊。

到了嘉靖十八年,薛瑄从祀之议已臻高潮。是年,御史杨瞻、樊得仁相继上疏请祀,朝廷遂令群臣共议,获得包括霍韬、张邦奇、陆深、唐顺之在内的二十三位朝臣支持;然而翰林检讨郭希颜又以薛瑄"无著述功"为由反对,致使此次请祀仍未成功①。此次上疏的杨瞻为山西蒲州人,不仅为薛瑄同乡,更系薛瑄弟子杨谌裔孙;而樊得仁则为陕西朝邑人,曾于嘉靖十一年担任河津知县。由此可见,以河东为中心并向周边地区辐射的地缘与学缘网络,再次于薛瑄从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支持者努力通过书籍编纂与出版实践塑造薛瑄"著述大儒"的形象,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他们对《读书录》的改编已很大程度地偏离了薛瑄原意。嘉靖年间,薛瑄同乡张润便对此颇为不满,并对支持薛瑄从祀的陆深道:

> 曾闻刘少师晦庵言,《读书录》乃公记每日所得,故不厌重词复说,以资寻绎玩味,最可观。后来为人分类剖析,作著述之体,殊非本旨。近樊御史得仁所寄重刻本,则又决裂破碎矣。不但著书之难,而传书之难如此。②

张润在薛瑄从祀议题上的立场虽因史料阙如难以考证,然其身为薛瑄乡人,应不至于反对从祀。尽管如此,他仍对从祀支持者为迎合"著述"标准而强改《读书录》性质的做法深感不满,认为"殊非本旨",更批评上疏请祀的御史樊得仁所寄新刻本"决裂破碎"。

嘉靖二十一年前后,又有礼科给事中陈棐上疏请祀薛瑄,其策略与弘治九年上疏的杨廉相类——皆先奏请于地方祠祀薛瑄,并借官方之力刊布其著述,以期"颁刻公书于天下",从而为日后的从祀之议累积文献与舆论基础。陈棐系河南鄢陵人,而薛瑄之父薛贞曾于永乐年间任鄢陵教

---

①《明世宗实录》卷二三五"嘉靖十九年三月",《明实录》第 81 册,第 4806—4807 页。

②陆深:《俨山外集》卷十六,《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子部第 34 册,北京出版社,2010 年,第 83 页。

谕,故薛瑄早年曾“以随任之例补弟子员于鄢”;基于这段渊源,陈棐尊薛瑄为“先达”,并据此请求朝廷于鄢陵为薛瑄立祠①。

与陈棐请祀之举相呼应的,则是他三次推动薛瑄著述的系统性编印。在其上疏的十余年后,陈棐转任山西提学副使,甫至山西,便“首至河东,入公之故里,谒公祠墓,访其宗裔,搜辑手泽,散失备询”,并将推动薛瑄著述刊印的过程概括为“三遇其会”:

> 予始奏刻公书,一时人士同心仰重,初以《全录》奉赵王枕易,王即刻之藩邸;继以《全录》贻侍御赵君玉泉,君即刻之闽省;今以《全录》复沈君维藩,沈即刻之闻喜。②

此处所言“赵王枕易”,即自号“枕易道人”的赵康王朱厚煜,而“侍御赵君玉泉”为福建巡按御史赵孔昭,“沈君维藩”则指闻喜知县沈维藩。由此可见,尽管陈棐于嘉靖二十一年所奏“颁刻公书于天下”未必能够获得朝廷的积极响应,但他却以实际举措逐步推进薛瑄著述的刊传,从而为其后续的从祀累积文献基础。

嘉靖三十四年,沈维藩首先刻成《薛文清公读书全录》二十二卷,此本即《读书录》十卷与《读书续录》十二卷之合刻本③。版本对勘显示,该本的《读书录》部分源自正德十五年郑维新刻本,而《读书续录》则出自成化元年徐孚刻本。由此引出一个关键问题:作为薛瑄从祀的坚定支持者,陈棐何以未采用阎禹锡“分门别类”的改编本,反而选择向原刊本系统回归?沈维藩刻本序后附有《重刊读书录公移》一篇,或可对该问题有所回应:

> 考之弘治中尝奉诏刊于书坊,不遵先生手录之书,误用门人分删之帙,自后未有合刊之者……该县合而刊之,知所表章矣。岂惟三晋之士有以学其学焉?布之天下,人人见全书矣。其自今而后,得有所据考而兴起焉者,此书助之。④

事实上,与前述张润所言类似,并非所有乐见薛瑄从祀的士人都会对阎禹

---

①陈棐:《刻薛文清公读书全录序》,薛瑄:《读书录》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四年沈维藩刻本,叶二至三。

②陈棐:《刻薛文清公读书全录序》,薛瑄:《读书录》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四年沈维藩刻本,叶三至四。

③此本现国家图书馆有收藏(索书号:08905),仅被著录为“《读书录》”。

④沈维藩:《重刊读书录公移》,薛瑄:《读书录》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四年沈维藩刻本,叶三至五。

锡改编本持积极态度。文中所言“弘治中尝奉诏刊于书坊”之本,即弘治九年杨廉奏请刊行的阎禹锡改编本。陈栗虽积极推动薛瑄入祀,却对阎本持批判态度,认为是书尽管体例齐整,但也偏离了薛瑄“手录之书”的原貌,不利于呈现薛瑄真实的学术思想。就此而言,陈栗在选择《读书录》底本时有意向原本系统回归,不仅反映出尊重薛瑄原意的审慎态度,亦折射出原本系统在山西地区的广泛影响。而《重刊读书录公移》结尾“布之天下”一语,实际上仍将此刻视作实现陈栗“颁刻公书于天下”理想的关键一环。

与沈维藩刊刻《读书全录》同年,福建巡按御史赵孔昭于闽中刻成《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卷,标志着薛瑄著述首次以“全集合刻本”的形态问世。该集包括《读书录》十卷、《读书续录》七卷及《敬轩薛先生文集》二十三卷,其中《读书录》卷首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河东薛瑄著,后学石州张珩校,后学邢台赵孔昭汇编重校”,可知底本源自嘉靖四年张珩刻本;《读书续录》卷首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河东薛瑄著,后学鄢陵陈栗校,后学邢台赵孔昭汇编重校”,知其所据底本为陈栗编本;而《敬轩薛先生文集》卷首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河东薛瑄著,门人关西张鼎校,后学邢台赵孔昭汇编重校”①,表明其所据当为弘治二年张鼎刻本。版本比勘显示,赵孔昭刊本诸部均对所据底本进行了系统性重编:如将张珩原刻《读书录》十一卷、陈栗所编《读书续录》十二卷分别调整为十卷与七卷;又将张鼎所刻二十四卷本《敬轩薛先生文集》之二十二、二十三卷合为一卷,终成二十三卷之规模。值得注意的是,沈维藩《重刊读书录公移》已然指出,陈栗编订《读书录》时有意回避阎禹锡“分门别类”之本,选择向原本系统回归。而赵孔昭刻本之《读书录》部分采用张珩刻本为底本,张珩刻本又源自原刊本系统,就此而言,该集的底本去取,实际上仍是对陈栗本意的延续。关于该集合刻本的形成过程,王慎中言“侍御赵玉泉君取先生之文与《读书录》并刻之为《全集》,以惠学者”②;而陈栗于沈维藩刻本序中言“继以《全录》贻侍御赵君玉泉,君即刻之闽省”,可知其仅向赵孔昭提供了《读书全录》部分之底本。两相参证,则将《读书

①薛瑄:《薛文清公全集》,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0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23、156、253页。

②王慎中:《遵岩先生文集》卷十五《薛文清公全集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84册,第166页。

全录》与《敬轩薛先生文集》合刊为全集之举措，或许并非陈棐原意，而是赵孔昭主动所为——这一情况亦在后续的赵府刻本中有所体现。

两年后的嘉靖三十六年，赵康王朱厚煜于藩邸中刻成《敬轩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读书录》十一卷《续录》十二卷①。是刻《敬轩薛先生文集》卷首载有王崇庆序，言："戊申之春，前司谏陈君文冈以纂修《广平志》驻节邯郸，是时予自南太常承乏工部，过而会诸丛台，乃于徘徊吊古、俯仰陈迹之余，文冈因以文清《全录》问序焉。"②所谓"戊申"即嘉靖二十七年，"陈君文冈"即陈棐。值得注意的是，王崇庆此序虽题为"刻薛文清公全录序"，内容却仅围绕《读书》二录展开，未有一语涉及《敬轩薛先生文集》。而《读书录》卷首所载王与龄序亦明言陈棐以"《读书》二录托赵王枕易殿下合而刻之"③，则知所谓"全录"当仅指《读书录》及《读书续录》，实未涉及《敬轩薛先生文集》部分。

尽管赵府刻本诸卷卷首均题"鄢陵后学陈棐校"，但版本比较显示，其《敬轩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实源自弘治二年张鼎刻本，《读书续录》十二卷则据成化元年徐孚刻本而来；至于《读书录》十一卷，则出自原刊本系统，体现出向薛瑄原本回归并拒斥阎禹锡改编本的倾向。陈棐嘉靖二十七年驻节邯郸，或许就在此时，陈棐将其所编《读书录》与《读书续录》付与赵王刊刻。由此可见，陈棐嘉靖二十一年前后奏请将薛瑄著述"颁刻于天下"后即寻找并联系出版者，然因其早年官阶尚低，影响力有限，或至升任山西提学副使后，才具备足够的声望与影响来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王与龄在撰序时亦自觉将是刻置于嘉靖间薛瑄从祀的大背景下，并积极回应对薛瑄"著述少"的质疑，认为"言愈多，道愈晦，圣人之不贵言也尚矣"，且再次将《读书》二录视为薛瑄"著述"，称其"阐扬造

①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有一部该集的万历八年（1580）后印本（索书号：402.6 11351）。较之先印本，后印本卷末多赵王恒易道人朱常清《书薛文清公全集后》一篇，则知后印本出版时已将《敬轩薛先生文集》与《读书全录》以"全集本"的形式刷印。

②王崇庆：《刻薛文清公全录序》，薛瑄：《敬轩薛先生文集》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本（索书号：T08924-39），叶一。需要指出的是，上图或因此序之落款为"嘉靖三十五年"，而将该本著录为"嘉靖三十五年"刻本；但《读书录》卷首又存有嘉靖三十六年王与龄《重刻薛文清公读书录序》，故知该集当刻于嘉靖三十六年。

③王与龄：《重刻薛文清公读书录序》，薛瑄：《读书录》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六年刻本，叶二。

化之几微,平易亲切,非身心体验者不能及”①。然而,赵府刻本《读书录》部分却并未采用体例严整的阎禹锡改编本,而是选择向原本系统回归,这固然体现了陈棐等人对薛瑄原意的尊重,但也在客观上与将《读书录》指认为“著述”的学理主张构成新的张力。事实上,这种在话语上强调“著述”价值,却在出版实践中向原本回归的做法,正反映出嘉靖间薛瑄支持者的新策略:他们逐渐从对“著述”定义的抽象辩难转向系统性、跨地域的出版实践,以更为具象的书籍形态塑造薛瑄“著述真儒”的整体形象。

三、祀议定而文献兴:万历间“全集本”的流行

在薛瑄最终入祀孔庙前,嘉靖年间其支持者的论辩策略已出现新的动向,他们逐渐从对“立言”的被动辩护,转向对“立德”与“立功”的积极建构,以弥补薛瑄在“著述”层面的争议②。这一转向在嘉靖十八年杨瞻、樊得仁等人的上疏中已见端倪。尽管当时郭希颜仍以“无著述功”质疑薛瑄,但支持者如黄佐已不再纠缠于对“著述”定义的论辩,转而主张“必报祀其振起习俗之功,而后道可永无坠也”③,意图以薛瑄教化实践之功回应关于其著述不足的质疑。嘉靖三十三年,山西巡按尚维持在上疏请祀时进一步提出“盖身体力行之功,不在乎言语文字之末”④,将薛瑄的“践履”之功置于“著述”之上,反映出此时支持者已形成一套弱化“立言”、突出“立德”与“立功”的叙述逻辑。

隆庆五年,薛瑄最终得以入祀孔庙,标志其儒学地位获得国家典制意义上的确认。这一划时代事件不仅终结了持续百年的祀议之争,更触发了一系列深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反响。在河东地域网络的加持下,薛瑄著述于万历年间的编纂呈现出向“文献集成”式“大全集”的显著转型。并且随着“从祀效应”的持续发酵,地方官员与士绅合力推动其著述以“大全集”形态系统刊行,此举既是对先贤学术遗产的全面整理,亦成为光耀

①王与龄:《重刻薛文清公读书录序》,薛瑄:《读书录》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嘉三十六年刻本,叶二。

②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修订版)》,第232—238页。[新加坡]许齐雄著,叶诗诗译:《北辙:薛瑄与河东学派》,第124—135页。

③黄佐:《泰泉集》卷二十《议薛瑄从祀疏》,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元年(1573)黄在中、黄在素等刻本(索书号:111826),叶七。

④尚维持:《表章真儒以励世风疏》,薛瑄著,孙玄常等点校:《薛瑄全集》,第1140页。

门楣、巩固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实践。

万历二年(1574),湖广巡抚赵贤以嘉靖四年张珩刻本为底本,于湖广布政司重刻《读书录》十一卷;五年之后,其又以山东巡抚身份,命青州知府王圻刊成《薛文清公读书全录》二十三卷,合《读书录》十一卷与《读书续录》十二卷为一编。值得注意的是,赵贤所主导的两次刊印皆以原本系统为宗:如《读书录》部分坚守原刊十一卷本之貌,而《读书续录》则以成化元年徐孚所刻十二卷本为宗。至万历十七年,薛瑄同乡、西安府同知高拱辰命泾县知县彭健吾重刊弘治二年张鼎编刻之《敬轩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该本虽已亡佚,然清雍正十二年(1734)薛敦俭刻《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首收存魏学曾为彭健吾刻本所撰序。魏氏强调"善论文者,当以斯集为《读书录》之左验云"①,此语不仅体现出万历间薛瑄著述经过系统性流通后人们对之的整体认知,更透露出将《敬轩薛先生文集》与《读书录》互为参证、系统阅读的自觉意识。

万历二十四年,薛瑄同乡侯鹤龄于河津故里编刊《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二十卷,此为继阎禹锡之后对《读书录》的又一次系统性重编。侯氏将《读书录》与《读书续录》中的内容悉数打散,并重新归于"五经""四书""太极图""道统"等数十个类目下,其分类体系较阎禹锡本更为细密。侯鹤龄自陈:"第载言浩瀚,散见错陈,难于记诵……逐条号记,分类抄集,窃以便览焉……末学抹拟更张,极知僭越,第为诵读,求浸涯则弗暇避逊。后之君子果谓诵习略便,则亦不余深罪也。"②由此可见,其编纂初衷在于方便后学诵习,然侯氏亦知此种"抹拟更张"实属"僭越",在很大程度上会偏离薛瑄原意。后世四库馆臣便对侯氏此举深表不满,指其"所记错杂……去取之间,颇失瑄本意"③。

需要强调的是,侯鹤龄改编《读书录》的动机与成化年间阎禹锡有本质区别。阎氏重编旨在回应薛瑄从祀时所遇"无著述"之质疑;而在侯氏编纂时,薛瑄已入祀孔庙二十余载,其改编工作已不再服务于为从祀辩护,反而更多出于学术传播与阅读层面的考量。正如赵用光在序中指出,

---

①魏学曾:《薛先生文集序》,薛瑄:《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首,天津图书馆藏清雍正十二年(1734)薛敦俭刻本(索书号:S5956),叶二。

②侯鹤龄:《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总目》,薛瑄:《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侯鹤龄刻本(索书号:824103-110),叶一。

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三,中华书局,1965 年,第 790 页。

该书并非“以著述求之”,而是侯鹤龄“以自为适”的产物①。这一转变,折射出薛瑄从祀孔庙后,其《读书录》诸书的编纂范式从带有政治目的之“著述化”趋势,转向更具学术自觉的“实用性传播”。

而在侯鹤龄刻本卷末,存有一篇万历二十四年署“孝义后学赵讷”的跋语。孝义为山西汾州府辖县。赵讷自陈“请刊《全书》数年”,但因“刻书之费已劳且难”而进展颇缓,并暗示其《全书》的刊刻过程实与侯鹤龄《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之编刻同步②。今考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存有《薛文清先生全集》一部(索书号:集 017-0006),五十三卷,著录为“明刊本”。其卷五三末载有赵讷《请刻全录序》,序曰:“讷无似生先生之乡,自幼好读先生之书……乃请于同志相与校分先生《读书录》并文、诗二集……刻置大邦,遍给学者,使知所宗焉。”③就此可知,该集当为赵讷刻本。该集前四十八卷以“内”“外”分集,其中《内集》二十二卷,即《读书录》十卷与《读书续录》十二卷;《外集》二十六卷,所收皆为薛瑄诗文④。《外集》后又有《附录》五卷,载录他人为薛瑄所作状、铭、碑、传、祭文及其从祀过程中诸人所上奏疏。这一编纂模式,流露出构建薛瑄著述与生平材料之完整系统的鲜明倾向。

《薛文清先生全集》卷首载有山西巡抚魏允贞所撰序言。魏氏从“学敝于何?在颛门户耳”的讨论出发,批评了近世以来详分学术类别的风气,并高度评价赵讷将薛瑄诸著述汇为一书的行为⑤。序后又有《凡例》七条,集中体现该集的编纂体例与价值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赵讷此集之编纂大致与侯鹤龄《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同步进行,但在《读书

---

①赵用光:《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序》,薛瑄:《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卷首,叶三至四。

②赵讷:《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后跋》,薛瑄:《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卷末,叶四至五。

③赵讷:《请刻全录序》,薛瑄:《薛文清先生全集》卷五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刊本,叶二十七至二十八。

④诗文部分在张鼎所编《敬轩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本的基础上,又对其文体排序与分卷位次作出改编。

⑤魏允贞:《薛文清公全集序》,薛瑄:《薛文清先生全集》卷首,叶一。按,该本阙魏允贞序落款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另藏有一部《薛文清先生全集》(索书号:261231-50),《明别集版本志》著录该序为“万历二十四年南乐魏允贞”所撰(崔建英辑订,贾卫民、李晓亚参订:《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 年,第 530 页)。

录》版本的考量上，赵讷却未选择向侯鹤龄本靠拢，反而认为侯本“分析太繁，更生支离”，故“只依闻喜旧本”（即嘉靖三十四年闻喜知县沈维藩刊本，该本出自原刊本系统），旨在“不失言者之意而已”①，展现出与侯鹤龄本不同的编纂旨趣。

赵讷采用“内外集”的体例分别收录《读书》二录与薛瑄诗文，实际上继承自古代子书“内外分帙”的编纂传统——在此体例中，“内集”通常被赋予更高的学术地位，而“外集”的地位则相对较低②。由此可见，赵讷通过这一编排方式，有意为薛瑄的各类著述建构出内在的价值层级，其中《读书》二录无疑被置于这一层级的最顶端。尽管就内容而言，是集中“子部”的重要性显然要远胜于“集部”，但从明代“人人有集”的文化语境出发，将《读书》二录纳入“全集”的整体框架，亦与当时别集“著述化”的发展趋势③相契。正如山西巡抚魏允贞为该集撰序时言，“此其意独表扬先哲，嘉惠来学也哉”④。赵讷此举不仅是对薛瑄著述的一次系统性整合，更是在确立从祀的背景下，一种自觉弘扬乡贤与建构地方文化认同的编刻实践，体现出“从祀效应”对书籍出版与学术传播的推动。

万历四十二年，薛瑄八代孙薛士弘于真宁知县任上重刊张鼎所编《敬轩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从该集卷首序后所载“首事人”⑤均为薛氏家族成员可知，此次刊刻得到了薛氏家族内部的鼎力支持，体现出从祀背景下的宗族自觉。同年，陕西监察御史张铨于关中刊成《薛文清先生全书》四十六卷，合《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二十卷、《敬轩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薛文清公年谱》二卷为一编⑥。其中《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源自侯鹤龄刊本，张铨又对其类目有微调；《敬轩薛先生文集》则出自

---

①薛瑄：《薛文清先生全集》卷首《凡例》，叶一。

②详参李成晴：《内外集：子书内外分帙范式影响下的古代别集编纂义例考论》，《励耘学刊》总第二十八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52—71 页。

③详参何诗海：《明清别集的著述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第 76—89 页。

④魏允贞：《薛文清公全集序》，薛瑄：《薛文清先生全集》卷首，叶一。

⑤薛瑄：《文清公薛先生集》卷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薛士弘真宁官署刊本（索书号：402. 6 11352）。

⑥是书当前所见诸本均各自分行，未见有合刻本存世。但从是书所载序言之命名（如冯从吾《刻薛文清先生全书序》、龙遇奇《薛文清先生全集序》等）来看，当时应是以“全集合刻本”的形式刻出。

弘治二年张鼎刻本。该集卷首载有冯从吾所撰序,在对张铨刊刻薛瑄"全集"的动机作出诠释时,冯氏所言尤可玩味:

> 我国朝从祀四先生,咸真修实悟,有光圣门,而文清薛先生崛起永宣之际,于吾道尤有草昧功,盖一代理学大儒也。所著《读书录》业已家传户诵矣,而《文集》人多未之见。且白沙、敬斋、阳明三先生俱有《全书》行世,而先生独无,真为缺典。①

在明代从祀孔庙的四位"昭代真儒"中,陈献章、胡居仁、王阳明于万历间皆有"全书"行世,唯薛瑄尚付阙如。冯氏此言,生动诠释了"从祀效应"在出版领域的体现——入祀孔庙不仅是对儒者地位的官方确认,更推动其著述以"全书"形态进行系统性整理与传播。在四库馆臣看来,这种将各自为书的著述"合梓以传"之举应追溯至《朱子全书》②。鉴于朱子在理学谱系中的特殊地位,在薛瑄入祀孔庙后对薛瑄"全书"的编纂与出版,已不仅仅是身处河东地缘、学缘网络辐射内的士人们为"表扬前哲"开展的共同事业,更是确立薛瑄"昭代真儒"道统地位后的必然选择。

尽管早在嘉靖三十四年,福建巡按赵孔昭已于闽中刻成《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卷,赵讷亦于万历二十四年前后刻有《薛文清先生全集》五十三卷,可冯从吾仍在序中言薛瑄独无"全书"。此现象或可归因于书籍出版与流通的客观限制:赵孔昭刊本成书较早,且刻于福建,关中士人或难及之;而赵讷刊本又因经费所困,自言"刻书之费已劳且难",其印量恐难保证。相较之下,张铨于万历间亲自主持《薛文清先生全书》的刊印,彼时其官居监察御史,能够调动更为充裕的人力与物力,故该本无论在刊刻数量还是印刷品质上,皆较赵孔昭、赵讷二本更具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张铨刊本之影响亦得以从关中向周边地区辐射。

万历四十三年,时任浙江巡按的关中后学崔尔进又于任上重刊赵孔昭编刻之《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卷。该集卷端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河东薛瑄著,门人关西张鼎校,后学邢台赵孔昭汇编,后学关中崔尔进重校",标明是书的底本来源。崔尔进在序言中高度推崇薛瑄,称"三代之后,理学真儒,醇乎其醇,若朱文公之后,惟先生一人而已",并进一步指出其重刊该集时的深层考量:

---

①冯从吾:《刻薛文清先生全书序》,薛瑄:《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卷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张铨刻本(索书号:301 05584),叶一。

②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1498页。

窃尝谓国初之学与中季颇异。国初体而恒实,中季发而恒虚。先生之前,若曹月川先生端者,其学沉潜笃实,务于躬行,于先生为近之。即以视陈白沙、吴聘君,顾诚不知何如,而未闻有表章之者。余期访求其遗文,谋传诸而尚未能也。余诚不敏,惟是私淑前贤以正于学士大夫,以诒于来兹。庶几明学术而一人心者,是余志也夫。①

与此前赵孔昭为薛瑄从祀造势的刊刻动机不同,崔尔进此举意在表彰学术。万历十二年胡居仁、陈献章、王阳明同获从祀孔庙后,理学内部"践履"(实)与"心体"(虚)的路径分歧遂在祀典中形成鲜明对照。而万历中后期正值阳明学风靡江浙之际②,薛、胡二人所代表的"践履"一脉在此地的影响已日渐式微。如隆万之际的浙地士人骆问礼言:"薛文清公《读书录》小本甚多,窃尝读之,皆切近精实,非王文成、陈白沙二公比;今读其《全书》,乃知文清笃信程朱者也。诸小本皆陈、王二氏之徒所节,盖去其异己者,以是知读书当读全部。"③当市面流通的《读书录》多为经过删削的"小本"时,白沙与阳明的门人很可能延续对《大学》古本及《朱子晚年定论》的改编策略,对《读书录》进行"断章取义"式的剪裁,使薛瑄与《读书录》为理学传统中重"心学"的一脉背书。而"全集本"的出现,才最终使骆问礼得以洞悉薛瑄"笃信程朱"的本原面貌,是以便有"读书当读全部"的感慨。

在这一思想竞逐的背景下,崔尔进身为浙江巡按,又自认薛瑄后学,遂以同属"践履"一脉且同为北地大儒的曹端因文献未彰而声名不显为例,强调刊布薛瑄全集对传播薛瑄之学术思想及匡正浙地学风的重要意义。此举表明,薛瑄虽已凭借从祀孔庙获得"昭代真儒"的官方地位,但在胡、陈、王入祀后形成的学术新局下,薛瑄学说的传播与接受(尤其是在南方地区)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崔尔进的重刊行为既源于其个人对薛瑄的推崇,亦反映出江浙地区特定的学术生态与思想竞逐格局。就此而

---

①崔尔进:《薛文清公全集序》,薛瑄:《薛文清公全集》卷首,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索书号:316-0101),叶五至六。

②一个重要表现,即阳明文集于隆万年间在江浙地区的持续性编刊。详参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孔庙从祀与乡约》,第 133—142 页。

③骆问礼:《续羊枣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 112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84 页。

言，在“尊前哲”与“正学术”的双重动机作用下，崔尔进最终完成了《薛文清公全集》的重刊。

要之，隆庆五年薛瑄入祀孔庙，标志其“昭代真儒”地位经官方确立，也开启了以“从祀效应”为核心的书籍出版阶段。赵讷、张铨、崔尔进等人纷纷编纂薛瑄“全集”或“全书”，诸人动机虽异，却共同反映出“孔庙从祀”的双重驱动力：一是国家典制对儒者地位的确认，激发了地方与家族的文化自觉和出版热情；二是学术思想竞争的文化语境，促使支持者通过书籍出版来巩固并扩散其学术认同。薛瑄著述以“大全集”的姿态在万历间流衍，成为观察明代中后期儒学正统建构、地方文化塑造与出版实践互动的一个缩影。

结语

薛瑄从祀孔庙的经历，始终与其著述的编刻过程紧密交织。本文通过梳理薛瑄著述的版本流变，揭示其“从祀之议”与“著述编刻”实为一体两面之关系：针对从祀过程中“无著述”“著述少”的质疑，支持者一方面在话语层面拓宽“著述”边界，将《读书》二录与其文集纳入“立言”体系，并渐次转向“立德”“立功”的申说；另一方面通过对薛瑄著述持续不断的整理、改编与刊刻，塑造薛瑄“昭代真儒”的整体形象。从阎禹锡的早期改编，到陈棐推动的跨地域出版，再到万历间“全集本”的流衍，薛瑄著述“变动不居”的特征，即暗示出版实践始终与其从祀进程存在深层的互动。

在此过程中，“地域”因素尤为值得关注。薛瑄最终获祀及其著述出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河东为中心、辐射陕豫的地缘与学缘网络。其中长期主导山西周边知识接受的《读书录》原刊本系统，又与官方推行的阎氏改编本构成显著张力，展现出地方对知识传统的自主选择；而陈棐在嘉靖年间积极推动薛瑄著述的跨地域出版，实际上亦源于其与薛瑄间的特殊“乡谊”；至万历间“全集本”的流衍，其背后同样有“地域”因素的浮沉隐现。此过程表明，儒者进入“道统”的历程，既离不开朝廷典制的官方确认，亦有赖于地方网络与书籍出版的持续推动。

【作者简介】张翼，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代文学与文献。